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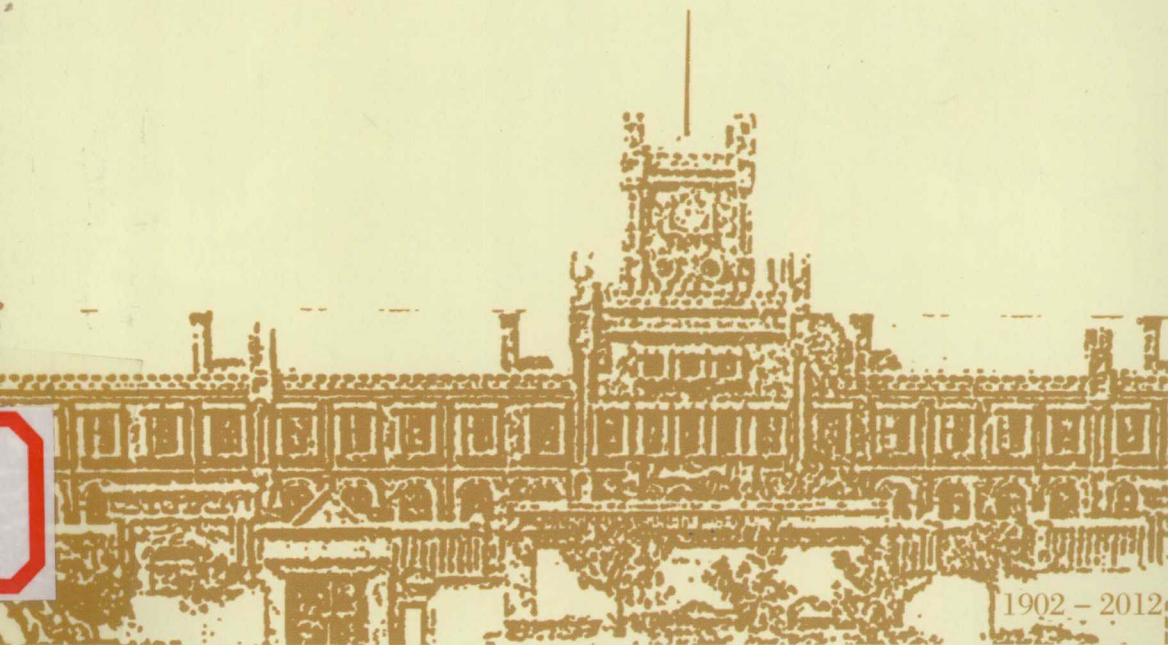
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

关公信仰与 地方社会生活

——以山西解州为中心的个案研究

GUANGONGXINYANG YU DIFANGSHEHUI SHENGHUO

闫爱萍 著



1902 - 2012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

关公信仰与 地方社会生活

——以山西解州为中心的个案研究

闫爱萍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公信仰与地方社会生活：以山西解州为中心的个案研究 / 闫爱平著. --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4
ISBN 978-7-203-07709-1

I. ①关… II. ①闫… III. ①关羽(160~219)-偶像崇拜-研究-运城市 IV. ①B933 ②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3393号

关公信仰与地方社会生活：以山西解州为中心的个案研究

著 者：闫爱平

责任编辑：傅晓红

装帧设计：王聚金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山西力新印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8.25

字 数：240千字

版 次：2012年4月 第1版

印 次：2012年4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7709-1

定 价：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 学术文库》序言

2012年5月8日,山西大学将迎来110年校庆。为了隆重纪念母校110年华诞,系统展现近年来山西大学创造的优秀学术成果,我们决定出版这套《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

山西大学诞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时代,在“西学东渐,革故鼎新”中应运而生,开创了近代山西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先河。百年沧桑,历史巨变,山西大学始终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学术实践,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办学业绩。百年校庆以来,学校顺应高等教育发展潮流,以科学的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创新,实现了新的跨越和腾飞,逐步成长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科研实力雄厚的具有地方示范作用的研究型大学,谱写了兴学育人的崭新篇章,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大学因学术而兴,因文化而繁荣。山西大学素有“中西会通”的文化传统,始终流淌着“求真至善”的学术血脉。不论是草创之初的中西两斋,还是新时期的多学科并行交融,无不展现着山大人特有的文化风格和学术气派。今天,我们出版这套丛书,正是传承山大百年文脉,弘扬不朽学术精神的身体力行之举。

《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的编撰由科技处、社科处



组织,将我校近 10 年来的优秀科研成果辑以成书,予以出版。我们相信,《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对于继承与发扬山西大学学术精神,对于深化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对于促进山西高校的学术繁荣,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谨以此丛书献给历经岁月沧桑,培育桃李芬芳的山大母校,祝愿母校在新的征程中继往开来,永续鸿猷。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001
第一节 关于选题	002
第二节 相关问题的学术史回顾	007
第三节 研究目的、意义与方法	022
第四节 田野历程	026
第五节 论文框架和关键词的界定	030
第二章 关公信仰演进史——官方与民间的建构过程	033
第一节 关公信仰的产生:南北朝至唐代	034
第二节 关公信仰的发展:宋元时期	042
第三节 关公信仰的高潮:明清时期	049
第四节 关公信仰的低沉期:20世纪50年代~70年代	068
第三章 关帝灵光与常平村人生活	074
第一节 盐池边上的关帝故里	076
第二节 常平村人的历史记忆	087
第三节 常平村人的日常生活秩序	098
第四节 村落的源流、家族与生计	107
第五节 村落信仰民俗之体系	114



第四章 关公祭祀仪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表达	123
第一节 清明节与中秋节:联村祭祀	126
第二节 四月初八:关帝巡城	135
第三节 六月二十四:关老爷过生日	142
第四节 九月十三:金秋大祭	146
第五节 关帝灵签	151
第五章 关公信仰观念的复合性	158
第一节 地方精英	160
第二节 关氏后裔	175
第三节 普通民众	179
第四节 朝圣者	184
第六章 关公信仰功能的历史承继与当代演变	191
第一节 关公信仰的社会功能	192
第二节 关公信仰功能的延伸:关公文化旅游	214
结 语	227
田野日记	234
附 录	264
参考文献	270
后 记	283

第一章 绪 论

在中国,关公信仰是一种历史悠久、绵延至今的令人瞩目的民俗事象。它肇始于隋唐,发展于宋元,至清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百姓都崇奉关公,视其为忠义的楷模,并进一步粘连附会,口口传颂,形成了文化积淀甚为厚重的关公传说圈,深刻地影响着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炙手可热的崇拜现象在大陆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一度沉寂,但是伴随着改革大潮,关公又在民间恢复了威震华夏的神灵地位,成为当代社会文化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关公作为普适性的神灵信仰符号,其信仰分布的广泛性、庙宇建设的普及性、仪式活动的普遍性,这些都是古代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活动的文化表述。关帝故里作为关公信仰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关公信仰的交汇点。在传统社会中,关公信仰是皇权话语和地方话语相互认同的交汇点,这种现象千余年来一直传承而始终没有断裂,成为关帝故里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文化符号。以关帝故里为个案考察本身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仅可以观照关公信仰的广泛性、代表性、丰富性等特征,而且可以考察在地域社会中关公信仰所承载的地方性意义及其表述方式。

山西解州被称为“关帝故里”,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关帝庙,显然这是关公信仰在关帝(关羽)作为历史人物的出生地的一处重要景观,表明了关公信



仰文化在山西流行的特殊意义。本书以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现存国内最大的关帝庙和常平村的关帝家庙等关公信仰的建筑载体，以及围绕庙宇内外所产生的一系列民俗事象为研究对象。选取解州镇及其下属的常平村为主要田野调查地点，运用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试图对“关帝庙”内外的生活语境进行整体观照，并在此基础上对现存的关公信仰的祭祀仪式进行详尽的描述和分析，从而尽可能较为全面地描绘出关帝故里关公信仰的传统与现状，关帝故里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所拥有的各种信仰文化传统，从而将关公信仰置于当地社会生活整体当中来给予具体理解。本文欲将“关公信仰”置于文本与语境中加以综合考察，通过关帝故里关公信仰这样一个极富代表性的个案，以期在更宽广的意义上为关公信仰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而且也为研究中华文明历史上广泛流布的、具有文化统一认同意义的神灵信仰现象，提供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

第一节 关于选题

笼统地说，学术界目前成果丰富的各地、各类民间信仰的研究，几乎都是秉承了对于信仰事项的演进史、功能化等方面所做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关注的更多是长时段、普适性的研究，而缺乏从具体的区域和空间出发去质疑或者思考这些信仰的“在地化”原因，这与以往传统史学研究思路有着很大的不同，这表达着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而视角的转换，让我们仿佛置身于多维空间中，历史的多面性渐渐浮现出来，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对于传统关公信仰事象也可以做这样的尝试，即把官方层面和民间层面的关公信仰放在实实在在特定的地域空间

内,考察关公信仰的“普适化”与“在地化”是如何发生的。

“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提出,是后现代情境下关于地方性与全球性冲突的思维方式的思考,实际上,与人类学长期以来关于普遍主义与历史特殊主义的方法之争也有关系。^①历史特殊主义强调各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特征,主张具体细微的田野个案调查,相对轻视和避免宏大的理论建构,也就是说,从文化文本中寻找出来的意义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丰富多彩的。这种建立在文化相对主义上的方法论对传统的一元化知识观和科学观具有潜在的解构和颠覆作用。^②“地方性知识”的深层意义表明,正是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的,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情景条件。^③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本文选取关帝故里这样具体的地域社会进行考察是有必要的。

在当代社会中,无论是城市和乡村,崇信关公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而在运城地区,笔者还了解到有些人虽然在家里没有供奉关公,却经常在初一、十五等固定时间到关帝庙中烧香叩拜,祈求关老爷的保佑,因此,关帝庙成为关公信仰汇聚的焦点,成为当地的“标志性文化”所在。于是,古关帝庙旧貌换新颜,新关帝庙座座拔地而起,信众越来越多,香火日渐旺盛。在关帝故里解州附近的村落里,几乎村村都有关帝庙,而且官方与民间相互切磋,共商大事,每年都举办大型庙会,开展相关的文化活动,不失时机地恢复了对关帝的“金秋大祭”。这一活动大大吸引了海内外的关公信徒,且不说每年的大型祭典,即使日常也有不少海外华侨、关氏后裔不远万里重返关帝故里,寻根问祖,祭祀关帝,其中以台湾同胞居多。

对于关公信仰的关注与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开始,但是主要

①[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②叶舒宪:《地方性知识》,《读书》,2001年第5期。

③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哲学研究》,2000年第12期。



是国外学者研究居多。^①1949年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大陆学者围绕关公信仰进行了生成与演化的历史研究,做出了一批成果。这些成果多属史学范畴,限于历朝历代所留文献的梳理,主要依靠史料来研究关公信仰的历史脉络、信仰产生的原因等问题。研究多从文本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比较忽略关公信仰的活态传承现象,对于关公信仰与地方社会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的勾连——即关公信仰的“在地化”研究,尤其少见。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做出调整,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迁。关公信仰习俗从古代走到今天,已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其传承的活力让人惊叹不已,其基本表现在于:从传统社会和当代社会对关公信仰在官方和民间中被不断加以的建构,在每一个阶段建构中都有多种话语参与,每种话语都代表了特定的信仰主体。这些多种话语的存在和解说,必使得关公信仰呈现出多种价值观念诉求,且相互渗透和复合。对于这种建构过程的观察,需要掌握大量的文献,更加需要将文献置于一定的地域社会中,采取“普适化”与“在地化”两种表现相关联的眼光来进行研究。本文就是在这种眼光下,结合一个地方个案的调查,重点分析作为一种普适性的关公信仰是如何不断实现“在地化”过程的情况。

涂尔干认为,宗教产生于社会生活,同时宗教又表现了社会生活。世间的秩序似乎是神圣秩序复制的主体,宗教是用象征语言书写下来的社会生活,是观念和行为的隐喻体系。^②以台湾学者李亦园为代表认为民间信仰本质上是宗教,他把民间信仰称之为“普化宗教”(diffused religion)。所谓普化宗教又称为扩散的宗教,亦即其信仰、仪式及宗教活动都与日常生活密切混合,而扩散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其教义也常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也就缺少

^①如1941年日本井上以智为先生发表的《关羽祠庙の由来に变迁》一文,专门探讨关羽的信仰演变。俄国汉学家李福清(B.L.Rifin)《关公传说与关帝崇拜》一文,论述了各类关公传说,从而探讨与关公崇拜之间的关系。研究数量很多,不一列举。

^②[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王卓君、吕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10~212页。

有系统化的经典,更没有具体组织的教会系统。^①对于民间信仰,近年来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②民间信仰是民众意识的核心,日常生活中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深刻地理解蕴藏在仪式背后的民众对于超自然力量的神灵符号的个性认识和共性心理。

作为民间信仰中非常典型的关公信仰,对其研究有很多角度可以切入。相对于以往从文本的、长时段、宏观的角度考察关公信仰的历史演进史的研究范式,笔者试图将眼光投向在“地方性知识”体系下的关公信仰,希望对这个作为关帝故里的“标志性文化”符号进行解读,^③考察作为普适性的关公信仰在那些“小历史”中,即那些“局部的”历史,比如个人性的、地方性的历史;也是那些“常态的”历史,日常的、生活经历的历史,喜怒哀乐的历史,社会惯制的历史中是如何展演的。^④对于“关帝”这个神灵符号怎样深刻影响民众生活?在这种信仰的民间运作中,各个信仰群体所发挥的作用有何不同?这一信仰与地方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事实上,笔者以地方生活情境入手展开对关公信仰的研究颇受近年来民俗学界发展的影响。中国民俗学恢复重建之初,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式是“民俗事象研究”,^⑤研究者多着眼于“超越地方的民俗事象的表面分析”^⑥而忽视了对作为民俗主体的“民”的关注和民俗发生情境的探讨,意即对社会生活中人的关注和理解。这段时期,民俗学界对于宗教现象的研究多集中在一些民间宗教信仰事象上,很少将其放在发生情境之中。关公信仰的研究也同

^①李亦园:《文化的图像》下卷,台北: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180页。

^②王健:《近年来民间信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社会史角度的考察》,《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

^③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④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⑤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7页。

^⑥王铭铭:《王铭铭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样存在这样的不足。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反思之后,关注现实问题、注重田野作业成为民俗学界的共识,理论界也及时对此进行了总结,提出关注民和俗的共存、民俗事象与发生情境一体、以“民俗生活”为着眼点的民俗整体研究取向。^①在这种学科研究范式转换的背景下,刘铁梁教授在村落民俗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提出村落是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并从村落的实体性、自足性和村落的自我意识这三个维度论证了村落是进行民俗调查研究的基本空间单位这一命题。^②在村落这一具体情境中研究民俗,是实现民俗整体研究的一种途径。鉴于常平村的关帝信仰还不足以概括广义上关帝故里的情况,所以本文采用“广义”与“狭义”概念上的关帝故里相结合来论述地方社会中的关公信仰的传统与现状。

民俗学界对乡村信仰生活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其中不乏很有见地的文章和专著,他们多侧重从神祇崇拜、国家意识、社会风俗、民众心态、文化空间等角度对本土民间信仰、宗教进行研究。关公信仰作为民间信仰中影响重大的民俗事象,民俗学界给予的研究明显不足。所以笔者认为把民俗作为研究的手段,对关帝信仰采取个案研究的方式,以弥补文本研究的不足,而且关公信仰本身也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即存在范围普遍,地方特色不足。这与那些相对存在范围有限,地方特色明显的神灵信仰有着显著不同的特征和展现,从而为普适性的神灵信仰的研究增加个案类型研究。

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看,山西素以“表里山河”和“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而著称。山西运城市盐湖区不但有关帝故里常平村、关帝祖塋、以关公故宅形成被称为“关公祖庙”的关帝家庙,而且还有迄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全国武庙之首”的解州关帝庙,运城市内的关王庙等建筑。关帝故里被人们称为“关公文化的直根和源头”。从现实的角度看,一年一度在运城市举办的关公文化节及关公文化旅游广泛开展,尤其是近年来关帝在商界地位得到了突显,这些都为关帝信仰带来新的元素和特征。另一方面,作为关帝故里

^①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14页。

^②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运城地区在中华文化版图上晋、陕、豫三个地域文化交织之地,本个案研究特别关注这个地域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实践过程中一直传承着的关公信仰。我们可以设想,在积累了数个关公信仰研究个案以后,就能够通过对不同区域关公信仰的比较研究来看:由于时空条件不同,传统中国各个地域社会之间而表现出来的各自的特点及生存方式的不同,这对进一步推动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节 相关问题的学术史回顾

一、关于民间信仰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国外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颇多,如武雅士主编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1974)、魏勒的《中国汉人宗教的一致性与多样化》(1987)、王斯福的《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1992)等等,这些成果对中国民间信仰形式、分类、根源、功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且直到现在都被公认具有经典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大陆重新兴起以后,逐渐成为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外众多学者经过长时期的探讨,至今在研究对象、方法、内容等方面已积累了丰硕的成果,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全面、科学的民间信仰研究学术取向。产生的成果虽不能说汗牛充栋,但在数量上已经相当可观。

概括而言,在研究对象上,既有以全国范围为研究对象的宏观性研究,^①

^①参见金泽:《中国民间信仰》,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马书田:《中国民间诸神》,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郑土有:《中国的神仙和神仙信仰》,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等。



也有以某一特定区域为对象的微观性研究；^①在研究时段的选取上，既有以从古至今的长时段研究，^②也有以某一朝代或重要时期为断限的短时段研究；^③在研究方法上，从主要利用历史学的文献考证方法，到兼及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历史学的多学科交叉方法；而在研究内容上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从关注各类信仰主体到在“国家—社会”、“文化—权利”视野之下探讨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之间的诸多关系。上述这些研究共同构成了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民间信仰研究学术历程。而随着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研究视野的扩大，民间信仰研究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国历史提供了更多思考的空间，成为我们了解社会结构嬗变的重要线索。

鉴于本文主要是一项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地域民间信仰所进行的研究，因此在以下篇幅中，笔者将主要就民俗学界在近年来对传统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加以重点说明，当然同时也适当关注那些相关学科领域的成果。

近年来，主张眼光向下一直成为中国民俗学界的共识，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以前很少受注意的领域被研究者重新发现，成为进一步深入了解、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途径。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受到民俗学界的重视。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引起过当时众多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作为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的顾颉刚先生对北京妙峰山香会、东岳庙，福建泉州的铺境，广东东莞的城隍庙等作过初步的研究。他的田野调查的方法与精神至今值得我们学习。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江

①1992 年姜彬主编：《吴越民间信仰习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和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年又主编：《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徐晓望：《福建民间信仰源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年；杨利慧：《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等。

②宗力、刘群：《中国民间诸神》，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王秋桂、李丰主编的：《中国民间信仰丛书》第 1 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 年等。

③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2 年等。

村经济》中也曾对开弦弓村的民间信仰活动加以留意,探讨了灶王等神灵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此外,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论述还散见于当时不少关于民俗与社会风俗的论著之中,如胡朴安主编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张亮采编著的《中国风俗史》等。

目前国内对于民间信仰的研究最集中的学科当属民俗学。我们通过检索这些年的民俗学论著和民俗学杂志〔《民间文学论坛》(北京)、《民间文艺季刊》(上海)、《民俗研究》(山东)、《民俗曲艺》(台北)〕,从中我们可以清楚了解这些研究中几乎都涉及民间信仰。

纵观近年来的成果,民俗学界对乡村社会宗教信仰研究的著述,主要集中在民间信仰及仪式、庙会等几个方面,他们的研究多从神祇崇拜、国家意识、社会风俗、民众心态、文化与社会空间的建构等角度阐发,关注传统社会资源与现代文化变迁的关系,以及民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其中,对于乡村社会中不同群体参与的仪式与庙会研究给作者很大的启发。

王铭铭的《灵验的“遗产”——围绕一个村神及其仪式的考察》(2000年)通过对村落仪式制度的分析,试图展示一种具体的社区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分析在国家的宏大历史转型冲击下村落传统如何延续和重构的过程,并对单线性的现代化进行了质疑。罗红光的《围绕历史资源的非线性实践——从黑龙潭人的礼仪活动看历史与现实的“对话”》(2000年)也表达了相同的思考,他认为历史作为一种知识资源,并非一个单向的直线性发展过程,而是一个不断积累和解释的过程。刘晓春的《仪式与象征的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力与记忆》(2003年)通过对同处一个客家乡镇的两个信仰—仪式中心的考察、比较与分析,展示了区域信仰—仪式中心的变迁,论证了所谓传统的复兴与再造其实是国家权力、民间精英与权威、民众生活动力等各种因素互动与共谋的复杂的历史过程。

高丙中的《民间仪式与国家的在场》(2001年)确立了国家在社会中的命题,文章通过对仪式与象征符号的讨论,透视了国家、社会 and 个人的复杂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在不同时代的存在状态。一方面,国家在不同的社会背景

下可以成为民间仪式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民间社会在国家在场的情况下，亦可与之互动、融合，或将国家作为发展的资源，如将地方信仰转化为民族—国家象征符号，从而使使之获得合法性并产生积极的后果。文化仪式的相互承认、互融及至共谋正是国家与地方民族传统、政府与民众之间新型关系的体现。从国家意识与国家认可角度进行研究的还有郭于华的《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利实践的解释——陕北驢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2000年）等。

上述研究在阐明仪式象征意义及其内在逻辑的同时，更为关注仪式在现代复杂社会中的存在和作用，关注仪式行为、象征符号与政治和权利的关系，并且注意到仪式作为现代社会认同与社会动员的方式之一，既可以有整合、强固功能，又可以具有瓦解、分化的作用。他们将仪式作为文化时空中的人的活动的累积与过程，关注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行动者参与创构的相互关系，同时注重地方性知识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过程。

从日常生活与民众心态的角度来探讨民间信仰问题也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视角。赵世瑜对明清庙会问题的研究就多以此为切入点。《明清以来妇女的宗教活动、闲暇生活与女性亚文化》（2003年）一文则主要讨论了明清时期各类宗教活动与女性闲暇生活之间的关系，指出女性广泛参与各种宗教活动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女性亚文化。^①在《一般的思想及其背后：庙会中的行善积功——以明清京师泰山信仰的碑刻资料为中心》（2003年）一文中，他以京师的东岳庙和泰山信仰为例，指出明清时期的行善积功思想为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所共享，并且由不同身份群体采取不同形式在宗教仪式性活动中加以实践。而郑振满、陈春声的《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2003年）一书，力图把民间信仰作为理解乡村社会结构、地域支配关系和普通百姓生活的一种途径，通过考察乡村庙宇及其仪式行为这样一个复杂的、动态的、长

^①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